

## 基于话语分析的青年网络政治表达

■ 漆亚林 王俞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 数字化技术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正重塑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网络政治表达是公民的表达自由在网络空间的具体体现和新发展。智能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主要通过网络空间表达政治意愿、参与政治活动。青年网络政治表达具有表达内容的丰富性、表达身份的平等性、表达方式的情绪性等特征。通过话语分析能够洞悉青年网络表达和政治参与的现实图景和发展逻辑,从文本生产过程、文本消费特征和社会文化机制的维度阐释青年网络政治表达的话语权转向也许能够为青年政治话语体系建构寻觅一条有效路径。

**【关键词】** 话语分析 青年网络政治表达 话语权

### 一、研究旨趣与理论源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的发展寄托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当下,网络与新媒体正成为青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青年的政治表达和政治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公共社会空间,构建了公共网络话语平台,成为民间与官方沟通的重要渠道。不断壮大的青年网民队伍能够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与观点。通过话语分析视阈阐释话语及其背后的社会权力、社会结构以及深厚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利于呈现青年网络政治表达的现实图景,厘清话语生产机制,规避话语失范,进而探寻一条建构青年网络话语体系的有效路径。

话语分析源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主要用于语言学研究。1952年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首次提出“话语分析”概念,20世纪70年代英国批判语言学家将话语与意识形态纳入共域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以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开启了国际关系学界语言学的转向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话语在跨界研究中进入文化学和新闻学领域。

收稿日期:2018-01-28

作者简介:漆亚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新闻实务、传媒经济、新媒体。

王俞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新闻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研究”之子课题“新媒体与青年政治参与”(课题编号:2015YZD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荷兰学者梵·迪克则认为,新闻话语也是意识形态的话语。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首次提出了话语与权力结合的理论。话语是语言在特定情境下的使用和表达,话语分析则侧重考察在特殊语境下人们如何使用话语、如何构建话语及在话语互动中映射了怎样的权力关系。梵·迪克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在新闻生产的微观层面上揭示了新闻生产过程与社会话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新闻制作过程中存在两种文本形式:一种是新闻事件的源文本,即新闻事件的客观性来源;另一种是新闻文本,即新闻记者根据源文本对新闻事件的描述和整理。在由源文本向新闻文本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生产机制和明确的社会影响因素。这些生产机制和影响因素影响了新闻的生产,形成了我们对新闻的认知,进而影响我们对事实真相的认识<sup>[1]</sup>。从话语分析的视角看,话语具有主观性、社会建构性,它反映出所指对象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状况。英国当代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研究融合了英美学派和法德学派的话语研究特点,提出不仅要从语言学层面对语言文本进行研究,更不能忽视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研究。

## 二、在线话语:青年政治表达的另类空间

社会化媒体不断驱动日常生活政治化与政治日常生活化。通过网络场域的意义建构、公共讨论、符号衍生、语态重建和身份确认等话语模态的再形构体现了青年政治表达方式的演变主潮,并形成另类的政治表达空间。网络政治表达是公民通过网络空间话语表达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权利表现方式,是公民的表达自由在网络空间的具体体现,是公民表达自由的新发展,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裂变式发展,技术在网络政治表达中的作用日益增大,除了网络言论是网络政治表达的重要内容之外,表情包、黑科技、网游等技术话语都可能成为网络政治表达的内容。“网络政治表达创造了一个以科技为本、追求民主和自我参与决定的政治生活实践新模型。”<sup>[2]</sup>网络主体以互联网为载体,通过网站、聚合新闻平台、客户端以及微信、微博、QQ等社交平台,以个人或集体的形式“表达政治主张和政治意愿,以期影响政治决策和社会政治活动”<sup>[3]</sup>,创造了一个另类的政治表达空间。

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已经成为网络发展进程中最广泛、最活跃的政治参与者和代表群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2.1%;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青年网民占比最高,达到29.7%。青少年是网络的原住民和线上赋权的主力军。作为网络主体的青年在网络情景中使用话语或者建构话语模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将青年的年龄划定为14-35岁,独特的年龄界定使得青年具有明显的媒介使用特征,拥有较强的在线话语生产能力、鲜明的语言模式和权力偏向。

现实生活中,青年尤其是90后大多还处在人生的爬坡阶段,尚未成为掌握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主力,也不是现实政治表达的主体。但是在网络空间,新媒体赋权机制的平等性和去身份性使得青年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他们借助互联网的言论自由与匿名性,得以摆脱现实的束缚,自由发表言论并获得关注,拥有平等的身份表达和话语权。青年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正处在形塑阶段,对未知世界和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求欲,对于庞杂的政治信息和政治观点具有接受与表达的欲望,他们有着极强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怀,对于民族复兴和自我作为有着内心的自在统合。网络的快捷性、共享性为青年提供了广泛多样的政治表达空间,形成了在线情景意义的动态化和多模态话语,包括话语形态的多样性、语言的丰富性和话语

风格的多元性。青年通过发帖、评论、转发、点赞、打赏、表情包、漫画、视频等话语形态表达自身的诉求和政治观点,从海量的碎片化语料中寻找能激发个体正义感和操控网络语言构式的议题,对贫富分化、官场腐败、教育医疗等当下社会热点问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欲望。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常见青年网络抗争的身影。如各地出现的PX事件和医患冲突等。青年政治表达形态愈发复杂,网络语言往往经过意义重赋,表情信息迅速增长,符号化趋势愈发凸显。

### 三、文本重构:话语机制与政治镜像

#### (一)“模因”改变青年网络政治表达的语言构式

梵·迪克认为,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从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对话语进行清晰的、系统的描写。其中,“文本视角是对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语境视角则把对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sup>[4]</sup>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文本分析可以从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四个方面展开。网络语篇具有话语接入的丰富性和动态性,网络空间的文字、图片、动漫、视频等话语形态的融合正在重构网络话语文本。从词汇而言,青年群体网络政治表达中的词汇以音译词、自造词、引申词居多。网络语汇借助互联网的原子式传播生成的“模因”颠覆了网络词汇结构和语言构式,具有极强的共情性和流通性。“网络语言中极具感染力的网络流行语常被称作‘模因’(meme),是指网络语言中某一时期内流通最广泛、使用最频繁,常常具有‘一夜爆红’特质的、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的词汇或句子。”<sup>[5]</sup>热点新闻或公共事件中常常引发“模因”的生成与流行,在不同的网络情景中呈现出一定的权力关系、身份识别和政治镜像。

青年网民在虚拟网络中通过语料嵌入、语态融合、语篇衍生重构网络话语文本,进而形成特殊的话语体系、运行机制以及话语范式,通过网络平台传播拓展并以“模因”的构式表现出来,令人印象深刻。如“我爸是李刚”、“你幸福吗,我姓曾”、“躲猫猫”、“楼脆脆”、“然并卵”等一系列由政治新闻和民生新闻衍生出的网络词汇。而像“坑爹”一词原指调侃幽默的话语方式,随着一系列“我爸是李刚”等事件的发生与发酵,“坑爹”的情景意义发生了变化,由对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不满情绪的原生表达,衍生出对社会中权大于法现实图景的批判和对法治社会建构的期盼。“模因”的语言类型构造了相应的青年政治文化,表达了青年群体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网络语言正在构建一个新的青年政治表达世界。

从社群场域和传播形态而言,网络话语具有十分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但是从网络技术和应用惯习而言,网络话语包括“模因”却具有“连贯性”。网络话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甚至具有复原真相和集体记忆的功能。虽然网络话语较之传统话语体系过于随意、“易逝”,但却并不影响青年网民的沟通与交流,青年网民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与使用此类话语。网络话语的文本结构中存在着特有的衔接手段和连贯特征,这种独特的文本结构背后蕴藏着青年群体的特殊网络文化。

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青年网络表达的形态也日趋多元化,网络改变了原本完整自足的文本形态,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可写文本,网络语言的符号化趋势逐渐凸显,表情信息迅速增多。目前,通过第三方应用进行语言图形化的创新改造,出现了以“弹幕语言”和“表情语言”为特征的网络语言构式,丰富了网络表达形式。与此同时,表情符号作为网络语言的一种,也受到青年群体的欢迎,表情包中加入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符号元素,或许是将一种带有明显国家民族象征的政治性图像进行个人化、情绪化解读。虽然网络表情符号和政治话语的文本生产只是网络发展的局部节点,但却深刻揭示了媒介发展对青年网民政治参与及话语表达的影响。



## （二）话语消费凸显青年网络政治表达的权力转向

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实践行为背后,都存有权力话语运作的因素。权力话语涉及价值观念、文化参照和生活方式等多层意蕴,具有宏观指导不同群体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实践张力。“互联网+”时代,平等且自由开放的网络平台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参与方式和途径,拓展了网民的创作空间和参与热情,对热点事件或话题的网络消费行为催生了新型青年网络政治表达的流行话语体系。

青年话语体系是在网络用户积极参与、狂热消费网络热门话题和事件中建构而成,表征着青年一代对社会的理解、自我的认识和政治的认同,并渗透到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之中。如“表哥”一词原本是近亲兄弟之间的称呼,但在2012年被查出的贪腐案件中,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视察事故现场时面露微笑的照片引发人肉搜索,青年网友从这位官员身上“人肉”出了各种名表,并将其由“微笑局长”笑称为“表哥”。此后“表哥”成为以权谋私的代名词。而“表哥”一词也表明了青年网民对事件当事人最直接的批判,其中隐喻了对肇事者的愤慨以及对官本位思想和特权行为的抵抗。

青年群体在网络上对热点事件和现象进行消费和再消费,通过吐槽、评论和互动等方式参与网络政治表达,引发了两个重要的网络话语消费热潮。一是网络模仿体。即一种基于戏仿的话语修辞策略。如“反对日本人常”“这事儿不能说太细”“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以及“丹丹体”“海底捞体”“咆哮体”等模仿体。这种颇具幽默、暗讽、隐喻的表达方式具有“表达利益诉求、批评社会现实、揭露不平等权力关系”<sup>[6]</sup>的功能。二是政治波普。即对历史人物、政治语料的意义重构与艺术表现。如“杜甫很忙”“我就是喜欢你看不惯我,却不得不和我一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样子”、“你可以瞧不起我,但是不能瞧不起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波普艺术、商业符号与政治形象的结合创造出奇妙独特的网络语态。

青年网络政治表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内容上表现为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力张扬,表达形式上表现为传播符号的视觉化,主要集中于文本形式的变革。青年话语多采取幽默、通俗的口语化话语体系。如“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认真你就输了”等网络话语。又如“马甲”“灌水”等青年自创的网络词语,极具调侃、嘲讽的意味,这些都属于非规范化的语言。这种反讽戏谑、逻辑失序、风格失调、碎片混搭的话语组词方式突破了人们对语言的常规理解,抛弃了传统语言所具有的逻辑性和有序性,给人们造成理解困难和沟通障碍,对传统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的话语体系产生解构作用。大量的搞怪表情包、抓人眼球的标题以及新潮、另类等元素的介入,形成视觉冲击力,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

2016年以青年为主体的“帝吧出征”,以表情包为“匕首和投枪”征战脸书,大战“台独”势力。表情包本身并没有非常系统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配文有着充分的后现代性色彩,它会用一种诉诸情感、富于感染力的消费方式去连接我们对不在场同胞的感知。在以表情包为代表的网络亚文化中,视觉符号代替了沟通的主要内容。就如陈原在《社会语言学》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生活的某种特殊情境,不能使用或不满足于使用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常常求助于能直接打动人的感觉器官的各种各样的符号以代替语言,以便更直接、更有效,并能更迅速地做出反应。”<sup>[7]</sup>尽管两岸青年群体之间的政治理念存有冲撞的内容,但对娱乐性内容却有着同样强烈的兴趣与需求。这与参与主体90后们天性中喜爱消解权威、追求个性的社会心理密不可分。此事件过后,两岸网民的政治理念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但互联网上最活跃的两个青年群体之间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破冰。当下网络话语是在全民消费热点新闻和公共事件中不断产生的,其改变了网络话语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青年网络政治表达文本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是网民与媒介互动的结果。

### （三）社会文化与青年网络政治表达的情景共振

社会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形态,是经济基础的体现。它主要由价值观念、政治态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社会思潮、风俗习惯、社会风貌等内容构成。它渗透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之中。物质和文化的发展是人类世界语言演变、发展的基础,语言是社会文化和人类思维的载体,是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和演化的过程性活动。批判性话语研究认为,符号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社会动机。美国学者布莱特在其“语言和社会结构共变”理论中也提出了语言表达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共振关系。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政治态度、伦理道德、社会思潮、行为方式等文化元素对网络政治表达的话语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就体现了消费社会青年价值观和论理道德的变迁。郭美美的炫富话语以及网民对其进行的网络围剿与“围剿”则反映了商业主义盛行和规制失范环境下青年政治表达的话语主导策略。

网络政治表达具有一定的社会动机和文化条件,其核心是网络政治文化。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sup>[8]</sup>。网络政治文化主要包括网络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网络制度文化是针对网络政治现象的各种政策、法规和道德规范等。网络精神文化是指网络政治知识、政治心理、政治理念和政治情感等,对网络制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起着引导和推动作用。作为大众文化场域的网络,精英文化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网络文化愈发平民化与世俗化,娱乐成为大众参与的狂欢形式和政治表达方式。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现象的娱乐化设置与话语表达日益流行。许多网络政治段子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表达自身对于政府形象和行为的情绪,折射出青年网民的政治态度和情感倾向,其背后也承载着创作者和传播者的政治态度和认知倾向,隐含着青年网民的政治利益诉求。娱乐、诙谐的网络话语是以感官刺激、情绪释放来解放心灵的,构筑一个世俗文化狂欢的舞台,社会文化的发展将会不断丰富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帝吧出征”作为典型的组织化网络文化政治参与事件,其娱乐化的内容形式,在社会文化输出中实现政治交流,表现出我国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新特征。

## 四、冲突与协商:青年网络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路径

互联网为青年的政治表达提供了一个新平台,激发了青年的政治参与热情,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发展。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对传统权力的新助力,有利于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和现代化。移动互联时代给民主政治创造了新契机和新空间,但是随着技术迭代的加快、羊群心理的扩散,催生、助长了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以及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泛滥,尤其是“后真相时代”情感超越事实、观点遮蔽真相的状况,极易削弱青年政治表达的内容质量和传播效果,要从内因和外因入手加强青年网民的道德自制和网络法治建设,规范我国青年网络政治表达行为,促进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

### （一）从话语主体维度,推动青年话语自律机制建构

网络技术赋权,年轻人可通过微博、贴吧等网络社交渠道对国家时政或社会民生事件等发表见解,自由进行信息交流。近几年发生的事件,如“孙志刚事件”“表哥杨达才”“山西黑砖窑”等,都是因为有了广大青年群体的积极参与,才影响、改变了事件发展的进程与走向,青年群体在利用各种形式形成的网络流行话语,并通过“模因”进行网络抗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促使公众舆论监督主体意识的觉醒、促使“受众关注式”文化向“公民行动式”文化转型,潜移默化地培育了公共领域。

但是在网络表达与话语实践修复社会肌体的同时,也存在着网络谣言肆虐、网络暴力蔓延等“病症”。一些青年网民依赖于“人肉搜索”的信息收集方式以及“谩骂、羞辱”等表达方式,不但会导致监督行为“超载”,加大社会撕裂等非理性行为,甚至还会触犯法律。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社会结构转型和言语行为理性基础的研究,都与交往行动和生活世界的问题直接相关。公共社会的展开形式是社会交往,而交往行动和生活世界的基本内容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的理性基础则是交往行动的关键。网络话语所衍生的新型民主发展的关键在于倡导个人自律,自律是一种主观性的约束,需要适当的价值引导。青年网民话语自律机制的建构可从四个层面切入:一是公民素养的自我涵化;二是新媒介素养的自我培养;三是媒体责任的自我担当;四是网络道德的自我建构与自我约束。

青年不仅要明确网络政治话语的责任与义务,还应该扩大知识面,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各种网络政治信息,掌握当前的政治理论、政治形势和政治体制,增强自身的网络信息甄别力和政治判断力,形成独立、正确的政治判断,提升政治话语素质和能力,避免被他人利用和操纵。此外,通过网络话语体系适当融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之中,并加以契合主题和氛围的合理形式改造,会产生正面的显性效应,有利于增强教育功效,努力营造一个文明、理性、宽容的网络表达氛围。

#### (二)从主流媒体维度,以多模态主流话语引导青年网络政治表达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话语方式、话语角度、话语体系及其体现的权力关系有着巨大的差异。传统主流媒体代表的官方舆论场与新兴媒体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存在着强烈的话语冲突和博弈。传统主流媒体的语篇结构、语言秩序、语言句式具有规范性、权威性、公信力和严谨性,但是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模式比较单一、刻板,具有浓厚的宣传指向,意识形态过于外显,情景意义缺乏张力和想象空间。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由于传统媒体的失语与语篇失灵导致传播力和引导力式微,对青少年的影响极小。而新兴媒体的语料海量、话语碎片、话语模式情感性强,具有很强的创造性、颠覆性和流传性,深受青年喜欢。

2014年伊始,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已升级为国家战略。新型主流媒体的文化使命就是要建构新型传播体系,打造舆论引导新模式,以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引领舆论导向。因此,传统主流媒体要善于通过媒体融合打造文字、图片、视频、音频、H5等多种话语形态,通过创造社交性话语、智能性话语和视觉性话语相结合的话语模式以及具有流行性的“模因”,传播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文化,为青年政治表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高效的传播平台。如人民日报社的微博、微信和视频直播等移动传播平台建构的青年喜欢的叙事方式和话语策略,对青少年的三观形塑和政治表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三)从治理者维度,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建构清朗的网络话语生态

从表面上看,大部分青年网络话语都是愤怒、不满等负面情绪的表达,但青年网民使用负面情感词汇的真实意图是希望引起社会关注,从而改变不足,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在规范青年网络表达的同时必须清楚其背后所隐含的真实意图。但是,由于网络技术和网络生态变化太快,网络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于互联网的发展。政府应当引导青年群体正确认识网络政治话语,发挥其积极正向的引导功能,消除负面影响,为青年网络表达提供一个系统、完整、规范并与时俱进的法治标准,既要守住公民网络表达的法律底线,又要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当前网络表达和运营中还存在着一些“灰色地带”、“黄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以及引导力极强的“高级黑”,包括涉及意识形态“碰瓷”的网游、网产对青少年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甚大。因此需要加大规制建设和惩处力度,确保网络话语表达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网络法律法规是网络表达的基础设施和底线标准。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相继推出了《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服务信息管理规定》《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



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重要法律法规,国家网信办也对网上信息管理主体提出了八项要求,意在进一步规范网络责任主体和网民的权利义务,确立追责问责边界,形成较为完善的“以法治网”制度,做到网络管理“有法可依”。同时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增强青年的网络政治话语权,使之主动参与网络政治话语对话。缺乏对话的网络政治话语,是没有经过检验和锤炼的话语,它不可能成为凝聚青年共识的精神力量。

青年网络政治表达及话语建构与社会组织、团体以及网络运营商等网络主体的保障体系建设密不可分。互联网协会、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团体、社区服务社团等社会组织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互联网运营商需要建构社会责任体系和把关机制,对博客、微博、QQ群、微信圈、BBS等在线社区的政治表达内容和话语方式进行有效管理,只有通过政府的协同治理方能建成良性的青年网络表达话语体系和行动框架,提高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质量。

结语:移动智能技术创新对人们的政治参与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颠覆性影响,网民政治表达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最富有创造性、生命力的青年群体,其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和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会直接影响政治事件和网络舆论的生成、发展与走向。新媒体时代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部分弥补了青年现实政治表达的“贫困”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sup>[9]</sup>。网络空间为青年的民主诉求提供了多元化的表达方式,但由于网络文化土层薄弱,又为青年网络政治表达带来诸多问题,尤其是无理性表达和群体极化现象极易导致网络空间的负面情绪蔓延。一些青年精英也会因为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不同,在网络空间引导舆论和情绪导向,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线上冲突。同时,网络媒体的商业逻辑加剧了网络政治表达的情绪化。为了引起网友的关注,网络评论逐渐有了一种倾向,语不惊人死不休。于是,极端情绪化的评论多了起来,言语间多了菲薄与尖刻,少了理性与宽容,动辄围攻、谩骂<sup>[10]</sup>。标题党、标签贴、意识形态“碰瓷等”常常能生产流量和“十万+”文章,它成了青年网络政治情绪化表达和群体极化的催化剂。

社会问题和公共事件是青年网络政治表达的重要对象,也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借势发挥的“武器”。大多数青年面对重大公共事件和社会问题能够客观、公正地发表评论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但也有不少青年容易情绪化,出现非理性的政治意愿表达,甚至催生“网络暴力”,当然,青年网络政治表达的情绪化并非全然负面,在反腐反暴和官员不作为的网络表达中也起到一定的推动善治的效果。

本文旨在通过对青年网络政治表达进行话语分析,深入认识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及其话语表达的特质和发展趋势,以期对中国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有序发展,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命运共同体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 [ 参 考 文 献 ]

- [1] 赵学为:《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话语分析的应用:现状、局限与前景》,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5期。
- [2] 管人庆:《论网络政治表达的政府回应机制的建构》,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 [3] 陆士桢 郑 玲等:《对当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理论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9期。
- [4] 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6页。
- [5] 葛厚伟 别君华:《强势网络流行语模因的传播要素与社会性》,载《中国出版》,2017年第5期。
- [6] 曹 询:《政治表达与话语建构网络模仿体的话语功能及意义研究》,载《新闻界》,2013年,第23期。
- [7] 陈 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58页。
- [8] 吴建华 郭智勇:《当代中国网络舆论监督的政治文化内涵及其实践意义》,载《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 [9][10] 郑 恩 龚 瑶等:《基于话语分析与公共治理视角的新媒体事件话语生产类型及叙事模式》,载《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邢 哲)